

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通“三统”？*

王义桅 江 洋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思想，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通各国传统文化之道统，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包容近现代国际体系与新中国外交之学统，在信息时代弘扬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之政统；作为一种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作为一种价值，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中国外交准则，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时代机遇。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也面临美国霸权、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重挑战，任重道远。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道统 学统 政统 习近平外交思想

作者简介：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江洋，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国际治理研究所所长。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1-0001-14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专项课题“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编号：21XY15）的阶段性成果。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①

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含义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首先是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世界如何互动的相处之道，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是赶超美国，也不是回到汉唐，而是在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因此被写进宪法。其次是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即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被写进党章。最后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通话时一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②，被第 71 届联大主席汤普森称为“我们星球唯一的未来”，因此被写进联合国决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具国际影响力、感召力的部分。“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党章和宪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被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③

杜维明先生指出，孔子以道德理想（道统）和文化意识（学统）来转化现实政权（政统）的人世精神，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都具有错综

^①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7 日第 2 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2021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2021-12-15]

^③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年，第 48 页。

复杂的多样性。^① 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何通道统、学统、政统？

一 道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②

表 1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儒	道	释
共生 (Mutualism) ^③	共天 (Tao)	共业 (Karma)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自制。

“儒家治世、道家养生、佛家养心”，三者之间不是互相对立排斥而是彼此包容共生。无论是“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仁爱思想，还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正见正念，度己度人”的佛家五蕴皆空信仰，都包含和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四个维度，即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它们构成了一种综合、平衡、协调而整齐完备的人文主义。这些思想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基因。(1) 儒家的共生。儒家学说讲格局，对内是身家国天下，对外则是“差序疆域”。从周的五服，到唐的羁縻，到明清的朝贡，再到现在的伙伴关系，其实都是共生的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天下各民族其实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中央王朝将之区分只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儒家学说的秩序论和格局观都非常先进。(2) 佛教的共业。共业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想，主张人的因果链是互相影响的，这个其实很像荣格心理学的“集体潜意识”理论。“集体潜意识”

^① 杜维明著：《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

^② 葛兆光：《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载《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言。

^③ 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可与中文“共生”相匹配的英文单词，可用“共生”的汉语拼音。因为中文的“共生”讲“和而不同”地存在、“和实生物”地发展，讲“和合共生”，而“和合”又相互匹配、契合、协调、调整……“共生”含义如此多样，几乎没有一个英语单词可容纳。日本、韩文倒是有“共生”的说法，发音都与中文类似。

理论认为意识分为“个人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几个层级，人类的潜意识在集体潜意识层面是联通的，而且人类自古以来的共通的记忆会沉淀到集体潜意识中，个人和集体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3) 道家的共天。道家学说内化成了中国人的自然信仰，有时候也会被统治阶级所借鉴，甚至还影响周边国家。日本的神道教其实就是道教与日本自然信仰的结合。日本人的精神和历史源头是《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开篇的《神代（神的时代）》基本就是道教典籍的写法：“神道教中的统治阶级是高天原诸神，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高天原最高主神）的后裔，八百万自然神是人间的管理者（跟高天原神属于上下级关系但并不直接受高天原神的管辖）。”中国的道家或者说道教在体系上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要研究比较原初的道教思想，可以从日本的神道教来反推。不管道家、道教还是神道教，都很注重自然信仰和天。

分映万灯，万教归一。无论儒道释教义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中都包含了不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雏形。各家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天人一体”的宇宙情怀和“天人一家”的人类情怀。儒家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生态观，强调人应有生态情感与生态责任，敬畏自然，保护人类共有的生活家园。佛教强调“依正不二”“自他不二”，认为众生生存依止的外在环境——依报，和众生身心本身——正报，两者不可截然分离，一切众生的生存，都必须依赖于其他众生，生命主体与客体相互依存，互为缘起，“一体不二”。道教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体是小宇宙，自然是大宇宙，人与自然同构。道教主张“道法自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强调顺应自然规律，遵守自然法则，保护自然环境，节约自然资源，提倡“返璞归真”“崇俭节用”。基督教认为人是神创造的，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彼此体恤相爱。耶稣把爱人如己作为最大的诫命之一，要求基督徒遵行，强调不只是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也应该和睦相处、以爱相待。西方基督教的“兼爱”思想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几乎丧失殆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也就变成了一种美好的愿景。更何况基督教的观念具有明显的“我们—他者”（us - others）的分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基本语境是指基督徒。宗教共同体解体后，取代宗教成为西方精神武器的是普世价值观，不接受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和群体即被视为异端和非人，像这样极化的二元主义是一神教的固有矛盾，当今世界的诸多争端皆源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了西方

“我们—他者”的二元区分，以最大层面的包容——万教归一，帮助西方和世界找回早已丢失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伊斯兰教经典指出：“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古兰经》49:13）。《古兰经》这句话也就是说，“不同”是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了解彼此的动力，而不是冲突的原因。《古兰经》第109章卡斐伦第6段还有“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也有我的信仰”之说。“全人类都是一个民族”（《古兰经》2:213）也是伊斯兰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

万教归一。各种宗教、各种文明传统莫不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如印度古哲学思想 Vasudhaiva Kutumbakam（“四海一家”，The Whole World is One Family）与中国“天下一家”类似。印度教的“梵我合一”催生了泰戈尔“让我们相汇于鸟巢”的口号。印度文明的基本哲学是整体观念：宇宙万物都有生命，生命只有一个，却有亿万表现体，伤了别人的生命就等于伤了自己的生命。印度轮回转世的观念认为，人和其他万物都可能转换。因此，爱自己就必须爱万物。这就是“命运与共”的基本理论。

远在非洲的乌班图（Ubuntu）思想也蕴含了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智慧。“乌班图”一词来自南非的科萨（Xhosa）和祖鲁（Zulu）文化。在祖鲁语中，“Umuntungumuntungabantu”的意思是“一个人通过其他人才能成为人”，或者是“因为我们，所以我存在”（I am because we are）。乌班图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和联系，传递的理念是一个人生来就有义务帮助自己的伙伴与社群。乌班图思想主张，个人只有和谐地融入自己的社群，自身才能成为高尚的人。融入社群的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与伙伴直接面对面、积极地互动而完成的。乌班图这一非洲思想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处在于对人际关系的见解，尤其是社群的视角。主流西方思想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倡导他人要尊重个体追求自我的权利。乌班图关注的是与自己社群的成员和谐共处，并且成为整体中活跃的、直接的和积极的部分。大部分的西方崇拜主要是在制度化宗教场所中得到表达，而在乌班图，世俗的社群本身就应该崇拜的对象，并且这种崇拜通过与伙伴成员直接积极互动而获得。乌班图是一个脱胎于非洲传统生活实践的理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决策的过程是充分沟通与协商一致，决策的目的是实现群体内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乌班图思想是既强调实质正义，也强调程序正义的。乌班图思想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存在颇多共同之处。乌班图思想假定人性本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世界观。有学者比较了英美式审判进程与非洲

土著式沟通或谈判进程的异同。^①

表 2 英美式审判进程与非洲土著式沟通或谈判进程的比较

英美式	非洲土著式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推理逻辑来发掘真相； 关注是否违反法律。	承认直觉、感觉、情感与案件存在关联； 关注行动对社群或受害者的影响—没有普遍的受害者。
专业人士代表诉讼当事人； 法院对诉讼当事人做出意向或判决； 目标是促进社会控制和形成陪审团观念； 司法的主要目的是报复与惩罚法律和秩序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诉讼当事人积极参与到伤害或决议的界定中； 犯罪者被置于更能够理解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或更能产生移情的境地； 目标是关系和社会团结的恢复； 司法的主要目的是治愈与和解法律是保护人、产权和共同体的手段。
问责制是惩罚性处罚，或严格遵守法律； 整个体系是基于人性本恶与自私的假设； 整个体系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和等级制的价值基础上。	问责制包括向受害者和共同体赔偿、道歉和忏悔； 整个体系是基于人性本善但会犯错的假设； 整个体系是建立在社群主义和平等价值基础上。
权威是集中的（重视权力和权威）； 过程是情感中立和受控的。	权威是本地化和去中心的（重视联结与关系）； 过程是感性的，而且对于与案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实开放。
与银行或者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联系更加重要； 犯罪者被迫遵守法律调停者受责任感驱使。	与家庭或社群的关系更为重要； 犯罪者被劝服而遵守规范调停者为了共同体的健康而自愿增强兴趣和关切。
惩罚是为了威慑，这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观念—犯罪者是选择违反法律的聪明人； 过程能够区分犯罪者、受害者和社群。	伤害、产权和关系的恢复更为重要，这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犯罪者可能是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受害者； 过程让犯罪者、受害者和社群重新融为一体

资料来源：Ada Pecos Melton, “Indigenous Justice Systems and Tribal Society”, in Wanda D. McCaslin (ed.), *Justice as Healing: Indigenous Ways, Writings on Community Peacemaking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from the Native Law Centre*, St. Paul, MN: Living Justice Press, 2005, pp. 108–120.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有游牧、农耕和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② 在世界整体内在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为唯一选择的全球化时代，游牧、农耕、商业乃至工业文化的差异消失了，世界面

^① Ada Pecos Melton, “Indigenous Justice Systems and Tribal Society”, in Wanda D. McCaslin (ed.), *Justice as Healing: Indigenous Ways, Writings on Community Peacemaking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from the Native Law Centre*, St. Paul, MN: Living Justice Press, 2005, pp. 108–120.

^② 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序言。

临共同的文明挑战。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东亚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认为，“中国是欧洲文明的‘福分’，中华文化一直为西方文化提供滋养。但长期以来，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历史，更不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的德国哲学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就是‘我者’与‘伙伴’的交流，开放对话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互融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大门。”^①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希腊哲学强调人—自然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神关系，而中国哲学强调人—人关系”。^②

今天，这种“引人入胜的时候”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将三大世界级文明：中华文明（着眼于人—人关系，强调做人）、印度文明（着眼于人—神关系，强调做信徒）及希腊文明（着眼于人—自然关系，强调做事）再次融通起来，以文明之合，超越文明之分，在21世纪再现古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的文明历程，对接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和合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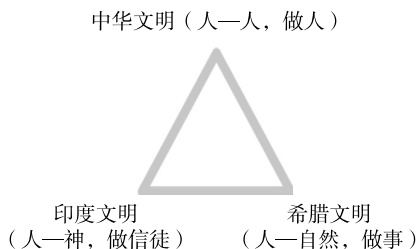


图1 三大世界级文明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当然，中、西、印文化的命运观是不同的。“西方的 destiny（命运）观强调必然性。它起源于希腊人的 moira（命运）观，与早期的圣地空间结构相关，后来又与 logos（逻各斯）联系起来，最后在理性化升级中，成为与 law（自然规律）类似的东西。对西方文化来讲，命运建立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印度的 pratīyasamutpāda（命运）观，彰显的是偶然性。印度人的缘起型命运建立在印度哲学的空—幻结构中。它关注现象上的每一因素、条件，注重在时点上偶发的各种互动，即所谓的 samutp（起）彰显的，命运就在偶然

^① 《中外学者共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载《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28日第8版。

^② [法] 勒内·格鲁塞著：《从希腊到中国》，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6页。

的缘会中产生（起）互动。中国的命运观则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中国人的气化万物中，具体之物因天地之气化而生，称为‘命’；一旦产生就有了自己的本质，被称为‘性’。产生之后，开始作为具体之物有了生、长、亡的过程。人的这一过程是在天地之间与天地互动而进行的，受天地运行影响，天地运行称为‘运’。中国的‘命运’内涵既有宇宙必然生物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产生之后在与天地的互动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两者的合一构成中国的命运观——既承认必然性，又注重灵活性。”^①

二 学统：继承并弘扬近代国际关系准则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②

西方有丰富的“人类”和“共同体”思想，甚至有“人类共同体”提法^③，中国的创新从人伦的时代表达——命运^④，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人类”不是人类世或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而是生活在地球家园的各国人

^① 张法：《命运观的中、西、印比较：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难点谈起》，载《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第263-273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16页。

^③ 比如，学者大卫·莫里斯表示：“要调和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跨越二分法的鸿沟，需要一种新的共同体架构。这种共同体需要是一种道德实体，需要包括所有个体并能够保持其道德的完整性；这种共同体需要可以容纳所有其他合法的、较小的共同体，从而成为普世价值的源泉。这种共同体只有一个：人类共同体。只有人类共同体才能满足人类价值统一的世界主义愿望和群体团结的社群主义理想。这种共同体需要关注全球问题的全球最高权力机构，需要各种职能上的超国家组织，当然也需要包含国家本身，同时依赖于以及各种区域和地方附属组织。”参见David Morrice, “The Liberal - Communitarian Debat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pp. 238 - 240.

^④ 长期以来，由于崇拜理性的选择偏好，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人作为共同体组件的工具性解释，到霍布斯政治哲学中对“人人为敌”的描述，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缺陷就在于不注重人伦，甚至否定、抵制人伦，从而造成对人本身及其共性价值的忽视。西方政治思想对人、人性、人类本身缺乏关怀，由此关注各种抽象的普遍主义和具体的特殊主义，从而导致无休止的对抗思维。参见姚中秋：《西方政治哲学的病理分析——以〈理想国〉〈利维坦〉为样本》，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第77-88页。

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尊重国家主权，让各国成为自己而非成为西方，成为人类而非异化为人工智能。不同于西方“共同体”的同质性和排他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最大层面的包容，以人类性消除基于一神论的负外部性。比如，康德、爱因斯坦等西方先贤有永久和平论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理念与之有何不同？前者是以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放射状思维，不是成为乌托邦，就是被扭曲、滥用。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被误用为以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被滥用为以同质性为前提、以实现同质性为目标，演变为“民主和平论”搞民主输出的悲剧，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并非复兴天下体系，而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天下体系”倡导“天下无外”“化成天下”毕竟是文明的差序结构，今天的全球化体系是主权国家平等的互联互通结构。单一神文明是信仰同一神的教徒（同质性）命运共同体，很难包容信仰其他神的教徒和不信神的人，并非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不是前世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亦非来世的“归宿”（destiny），而是今世的“共同命运”。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同面向共同未来。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并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尤其是社会学的“个体—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论，伦理学的契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的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学的万民法与正义论，宗教学的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彰显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西方社会是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

^① 国务院新闻办：《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2019年9月27日。

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①

共同体规模越大，生命便越能舒展，而最大规模的共同体就是普遍秩序^②，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指向这一普遍秩序。“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类幸福意识与生存意义的崛起。共同命运就是为了共同幸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点就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国家的需要从自利（self interest）扩展到共同的善（common good）。对于如何解决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这一问题，西方学者的答案也是寻求构建人类或世界性共同体。学者莫里斯表示：“要调和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跨越二分法的鸿沟，需要一种新的共同体架构。这种共同体需要是一种道德实体，需要包括所有个体并能够保持其道德的完整性；这种共同体需要可以容纳所有其他合法的、较小的共同体，从而成为价值的源泉。这种共同体只有一个：人类共同体。”^④ 共同善意味着各国都有独立追求本国人民共同价值的权利，但同时他国人民的福祉也应当是本国的关切。^⑤ 要实现共同善意识，需要各国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寻找全球解决方案，进行全球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应当加速而非逆转这一进程。

三 政统：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时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⑥ 马克思认为，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即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然的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的共同体”，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

①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② 姚中秋著：《孝经大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③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为了共同命运的善意和互动》，载《光明日报》2021年5月1日第8版。

④ David Morrice, “The Liberal – Communitarian Debat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2, 2000, p. 249.

⑤ James Mayall, *The Community of States: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p. 154 – 157.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体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弘扬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体现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四个自信’在世界观上的体现，也是中国立己达人品格的展示。要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塑造共同身份、共同使命，而且还要通过伟大斗争去争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实践，彰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②

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等设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都有付诸实现的社会前提，基本的经济前提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基本的政治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的思想的解放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今时代的理念与路径，是通向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必经路径，它同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两者也有区别：一个是就现实而言（不充分的、有限的、困难重重的），一个是最终理想（只有大同社会才能得到充分完整的实现）。这有点类似我们讲的现实纲领同最高纲领的关系。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也是书写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序章。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自由人联合体是“国家连同纺织机和青铜器都放在博物馆”（恩格斯语）后的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现今这个还以国家主权为主导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不完全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进行时，服务于将来时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我们迈入数字文明时代，是一种“自组织”的创新组织模式，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我们还迈入万物互联时代，要摆脱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解放思想，回归本源。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阶段——从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结合，到强调文化自信，就是把革命学说转化为人类命

^① 闻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学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第6版。

^② 王义桅：《处理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大关系》，载《北京日报》2021年2月1日第11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强调制度之争，而是强调命运与共，主张“各国历史文化和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①。当今世界，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气候变化等挑战层出不穷、日益严峻，原有机制和思维无法应对，一些国家故此开历史倒车，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助长反全球化、反体制、反智运动，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尤其是，在新问题、新领域更要摒弃冷战思维，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②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理念，其次是一种思想，最后还是一种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从价值取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权力观、新型利益观、新型文明观、新型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为人类和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新契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文明观。”^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展现了世界情怀和全球视野，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走出了近代“中—西”、“体—用”的思维逻辑，寻求人类价值观最大公约数；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关系从“互利共赢”到“命运与共”的逻辑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发轫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长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传统，成熟于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外交实践，是中国外

^①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强调解决时代课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25日第1版。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19页。

^③ 张艳涛、高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6期，第36页。

^④ 王毅：《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2018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年终采访稿），外交部官网，2018年12月29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812/t20181229_345695.shtml. [2021-12-18]

交哲学中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实践论的集大成者”^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战后民族国家独立时期，着眼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诞生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相连时代。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针对的主要是主权国家和依附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组织等单位，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后来拓展到同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和平共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单元则更为分散和多元，所有由人类所结成的、促进人类命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组织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从“和而不同”到寻求人类价值最大公约数，共同维护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赢”。

在当代，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倡导人类命运与共，同时超越意识形态与发展阶段差异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如今已是同一个世界。“三个世界”通过斗争求团结，形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源于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历史，又是对历史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有发展中国家提出，中国现在富强起来，我们还是命运共同体吗？其实，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是不忘初心，与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天然命运共同体，不过有不同层次：从“同仇敌忾+同病相怜”到“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支持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再到共同使命——解决人类问题的共同智慧与共同方案，不断升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从昨天看明天——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还是从后天看明天——前瞻性思考人类未来。万物互联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技术创新一方面在削减“中心—边缘”结构，另一方面催生国际思潮大变革。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热议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还要关注世界上10多亿没有用上电的人们，关注数字鸿沟、信息壁垒，改变周而复始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获取新冠肺炎疫苗方面，由于贫穷国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人类正经历关于疫苗的灾难性

^① 王义桅：《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第7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页。

道德崩塌。有鉴于此，中国率先宣布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人民，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就是疫情下的“致良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和谐世界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念，并拓展到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层面；从各国和谐共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到人类命运与共，基于国家又超越了国家思维，统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统筹秩序安排与价值共享，统筹现实身份与未来归宿，以兼具过程与程序的共同体思维，超越和谐世界的目标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命运与共理念也超越了传统全球化的互利共赢口号，为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支撑：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关口，习近平主席胸怀古今中外，心系东西南北，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在新时代将传统中国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思想予以升华，将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宗旨予以铸魂，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初心予以宣示，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予以弘扬，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而积极的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被多次写进联合国有关决议，引发中国与世界广泛共鸣、共振、共情。

当然，我们也看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惑或误解乃至抵制，国内外皆有，西方尤甚。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等问题容易干扰视线。不少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那样的乌托邦或复兴天下主义，是外交口号，不切实际。^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② 从思想认识到现实世界，世界政治生态的挑战十分严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时代机会。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也面临美国霸权、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重挑战，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王义桅著：《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23 页。

^②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1/c_1110796357.htm. [2021-12-18]